

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生的日常生活

——以重庆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为例

倪蛟

内容提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立中央大学由南京内迁重庆。从南京到重庆，从较为优越的和平时期变为简陋动荡的战时环境，在特定的历史场域之下，中大学生的生活状态游离于“变”与“不变”之间，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中大学生的求学生涯转入艰难岁月，其日常生活被打上鲜明而沉重的战时烙印。另一方面，由于大后方相时稳定的局面以及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苦中也有乐，逐步回归大学固有的内在语域。再者，中大校方和国民政府有意识的引导管控，加强政党渗透活动，介入学生私域生活，使得大学教育被“泛政治化”：

关键词 抗战时期 大后方 国立中央大学 学生 日常生活

倪蛟，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36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治下的大部分高校向后方迁移，国立中央大学（简称“中大”）即其中之一。1937年底，中大从南京顺利内迁至重庆。中大学生的战时生活是整个抗战时期国人生活状况的一个方面，战时的烙印深刻地镌刻于包括中大学生在内的当时国人生活之中。相较于战前，在重庆时期，战时环境、简陋艰苦的学习生活条件和国民党势力对校园的持续渗透，这三大因素对中大产生重要影响。这一时期中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由此发生各种新的变化，也反映出大后方大学生状况的一些共相。本文将聚焦抗战时期中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考察“战时”的学生生活特征，关注学生的“常态”表现，以及国家与政党对大学校园的控制与争夺。

一、战时景象：大学生生活的变化烙印

1937年9月23日，中大校方向全体师生正式发布了关于迁校事项的通知，“本大学现蒙教育部核准西迁重庆，借重庆大学于11月1日开学”。在正式发布迁校通告后，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左右，中大师生绝大多数到达预定集合地点或重庆。对于中大迁校工作的显著成绩，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在其回忆录中评估抗战高校内迁时给予了高度评价：“迁校最迅速而完整的是国立中央大学，全部员生及图书仪器，由南京溯江西上，直抵重庆沙坪坝建校。农学院农场的牛羊牲畜，舟运不便，由陆路徒走驱策西行，亦安全抵达重庆。”中大迁校工作之所以进展顺利，与全校师生抗战保校的爱国爱校热情密切相关，同时也离不开罗家伦坚决有力且运筹得当的调度指挥。对此，罗家伦事后坦言，在中大迁校的那段时间里，“我简直是学校里的‘狄克推多’（dictator，意为独裁者——引者注），我做了十几年的大学校长，从来没有像那时候这样的权力之大”。

中大内迁重庆后，由于时间仓促及条件有限，校园的一切生活设施都十分简陋。当时新建的房屋结构非常简单，“只是将木柱支持了屋顶，而在树木之间密密地编上竹片，在竹片的外面涂上黄泥以后再涂上石灰，那算是墙，于是大功告成便可以充作教室、实验室、寝室了”^①。彼时，张元济在抗战前夕曾到南京并参观中大，当时他的感观是，“看中央大学，那种宫殿式房屋，住惯了恐怕不能再回到内地去”。而此时，中大校长罗家伦称之为“国难校舍”，感慨“与京校相比，不啻天壤”。住宿条件远非南京时可比，“在南京时两三个人一个房间的梦早已打破，木床，双人铺，一个大寝室是可以容纳三百多个人”。宿舍内部亦是简陋不堪，“没有任何私人摆设和布置，空间也很小”。宿舍环境也恶劣“最难堪的是臭虫多和空气的不良”。当时，中大学生宿舍有“三多”之说：臭虫多、蚊子多、打摆子多（四川土语打摆子即是疟疾病）。因而，有中大学生感叹，“整个来说，中大是充满了战时景象的一个学校，朴素的生活，简单的起居，一切都说明中大同学是处在战争的影响之下的”。

大轰炸下的校园生活，最为直接地体现了中大学生的战时烙印。为躲避日机轰炸，“跑警报”成为中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校方将防空洞筑在山丘内，故当时有

句笑话“见机而奔入穴为安”。面对铺天盖地的大轰炸，身处防空洞中的学生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反应，“我们躲在防空洞里，只听得继续不断的一阵隆隆之声，声震洞壁，大家都屏息着，有的人则惊悸失措的爬在地上，有的人则把两只耳朵紧紧的掩着，有的人则骇得伏在人家的背脊上去”（III）。而有的学生在敌机来袭时，毫不把轰炸放在眼内，居然还在防空洞内睡觉、聊天、读书、抬杠、下棋、玩牌、恋爱，一切活动照旧。甚至，有学生还在苦报中自寻乐趣。中大学生王作荣的回忆就颇有趣味：“在暑假警报来时，常与三数同好至附近民家租用麻将及附件全副，在竹林中摆下阵势雀战，蛇虫蚊纳，一概不怕。几圈下来，不知苦报之已解除。”面对日军的空袭，中大学生在最初时有恐慌，但没有被吓倒，相反随着时间推移，在“跑警报”的过程中逐渐适应了战时环境。

不仅要习惯“跑苦报”的恐慌生活，而且要适应食不果腹的就餐状态。大多数中大学生每天的“求食”经历充满“曲折”，颇多艰辛。食堂开饭时，往往拥挤不堪，要为“抢食”而“战斗”。为多吃一些，1944年考人中大的王觉非还总结出“抢饭攻略”：“第一碗先少盛一点，只有半碗左右，赶快吃完，去盛第二碗时，再尽量盛得满满的”。另一中大校友王作荣在其回忆中谈到当时还有女生和男生抢饭争斗的情形，“抢饭必须先抢瓢，女同学们常是推选一位母老虎型的人物冲到饭桶边，手到摘来饭瓢一只”，并依次传给女生，以免落人男生手中，这让其从中感慨道：“我们只知道女人做皇帝，做内阁总理，比男人厉害，殊不知抢饭比男人更厉害，未来必然是女人的天下。”不抢饭可能要吃残羹冷炙，甚至挨饿一顿，但抢到饭的未必能饱餐。抗战初期，粮食部供应中央大学每天30担（包括教职工）平价米，这种平价米质量极差，杂有沙子、稗子、霉变米、老鼠屎，煮出来的饭难以咽，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菜的品质也不佳，品种基本是全素，比如胡萝卜、烂榨菜和盐水豆腐汤等，偶尔有一点肉，只是点缀而已，以致发生有学生因营养不足而两次晕倒在课堂上的悲剧。

在勉强应付吃饭问题后，大部分学生难以承受着装消费，衣着普遍不佳。在天暖时，男生穿的是一袭的败色的中山装或发白的长衫，女学生则是式样和布质大体相同的旗袍，且上面还有诸多补丁。即使爱美的女学生，也只能“把花布被面拆下做衣服，也有的把洗褪色的旗袍翻面制新”。在天暖时衣着破烂粗陋，而在天冷时节则难以御寒。有些学生冬天就坐在床上裹着棉被，不敢外出，“但吃饭时不得不到饭厅，于是有一个同学就把棉被裹在身上前往饭厅，同学们看到都开玩笑说，圣诞老人来了”。在当时校园内，广为流行“顶天立地”和“空前绝后”的说法，形象地概括了学生们衣衫的破烂相。所谓“顶天”，是指下雨天没有伞打，冬天没有帽子戴；所谓“立地”，是指鞋袜大多被磨穿，赤脚触地；所谓的“空前绝后”是指裤子的前膝和后臀部被穿破，相较于衣食等日常消费，中大学生最难以承受医疗费用。1942年12月，有媒体报道中大员生健康可虑，“以本部学生一千八百人计算，则患者经常近三分之二”。到抗战后期，由于患上重病而无钱治疗的学生不在少数：“中大同学透视检查的结果，十分之五六都有毛病，而且肺病害到二三期也不少。这种富贵病谁养得起呢？就尽让它拖。”有些患病的学生即使得到治疗，但就医过程一波三折、令人心酸。如中大学生吴睿焯因患牙龈发炎却无力就医一拖再拖，后病毒侵入颌下转为卢特式喉炎，不能说话继而拉水不进，奄奄一息，险些丧命。最终在校方的援助下，吴虽得以治愈，但欠下大笔债务，根本无力偿还，“实因生子身在外，无人接济，衣物变卖尚不能清债”。另一中大师范学院数学系三年级学生邓海肠享受公费救助政策，但在患上肺病后无钱医治。在向学校申请救济报告中，邓陈述了自己当时经济的窘境和病情的危重：“今本校医师嘱进医院治疗，急宜前往就诊，奈药费过大，无钱支付，而家在战区，就函无处告贷，危病在迫，不已恳请钧长核准医药贷金贰佰元，以救危急，不胜待命之至，喊然而，还没有等到校方回复，邓已不见踪迹，“审其情况，似有走失之疑”。

虽然环境简陋，生存堪忧，但中大学生依然展现出高昂的抗日热情。内迁后，中大重新成立学生自治会：此后，以学生自治会为组织核心，中大学生组织了救亡工作团，发起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每选节假日，中大学生分头宣传，三五人成一小队，手执小旗，有的在热闹的市街，有的到附近的乡村，唤起民众支持抗战；在发起抗战救亡运动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沦陷区，他们的家乡直接通受日寇战火的蹂躏。“感受切身痛苦，故除努力学业外，对于救亡工作，亦颇注意，组有歌咏团、居日团宣传组、墙报组等，以唤起民众”，民族主义情绪也最为强烈。中大学生不仅组织发起抗日宣传活动，还直接参军走上抗战的火线。1944年12月2日，日军攻陷贵州独山，贵阳朝夕不保，重庆岌岌可危之际，中大学生积极响应从军运动，报名者约一千余人，将近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121。中大校友萧承龄先生在回忆中也提及学生从军的热情和盛况：“我们学校有好多同学集体投军，临时组织一个连，大概有三四百人”，但后来由于战事危机的逐渐消解，参加从军的中大学生大多被遣返回校，不过“大家还不大愿意回学校去”。

内迁之后，由于战时环境的限制和影响，中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区别于战前状态，“变”成

为战时图景中的特征之一。从南京到重庆，中大学生的大学生活，外在是地理位置上的空间转移，内在是所处环境和氛围改变，即从条件优越的和平时期转变为简陋动荡的战时环境。纵然如此，身处不再平静的校园环境，中大学生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予以前所未有的关切。抗战时期，中大学生生活的空间变换与环境变化，由此大学生活被深深翅甫上了“战时”的特殊烙印。

二、苦中有乐：战时语境下的大学生活回归

虽处于战时环境，然而在抗战时期大部分岁月中，中大学生仍然是在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中学习生活。而且，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大学生逐渐习惯现有的时局和世态，校园生活中的诸多“平静”面相渐渐涵盖了“战时”指向，由此进入一种新的“常态”。

在抗战初期，一些中大学生向校方提出了十分激进的变革想法，其主要内容倾向于“完全战时化”。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就提出，鉴于“抗战形势的严重，争取战时教育，已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迫切的要求”，故而草拟了一份《中央大学学生战时教育方针草案》供全体师生讨论，并希望校方予以采纳。《草案》称：“期间教育的根本任务，在支持抗战，充实抗战，扩大抗战，培养各种抗敌救亡的干部，以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因而，要求在课程内容上“必须和抗战密切联系，以民族解放的政治教育为中心，学习各种和抗战有关的技术”，并且“把学校做救亡运动的中心，一方面学习，一方面深人民间去开展民众教育，组织武装等工作或其他有利于抗战的事”叫。但是，随着抗战的逐步推移，中大学生由抗战初期的激进态度转而理性认知，逐渐回归到应有的大学生活状态。

有人这样描述抗战时期中大的学习氛围：“这里的空气，是随着铃声而变动的，有时紧张得像快断了的弦索，有时是冷清清，只有几个人在那儿自修。你要问什么地方的空气是一天到晚一样的，我可以告诉你，第一是图书馆，第二是实验室。”阎先看图书馆的场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图书馆开放，阅览室总是满满的，很少发现空余的座位”。于是，为找到学习座位，到图书馆还要早去抢座。室内也非常安静，“你不敢咳嗽或谈天，静的威力镇压住了你，这里，只有翻书与拉机算尺的声音才不致叫四周的人们厌恶”。秩序亦是井然，很少人敢谈话，“双双的情侣互相代订位子，也不过相互的饱饱眼福，不能谈情说爱的，整个的图书馆只有笔和纸的接触‘吱吱’声和微细的翻书声”。而在实验室里，“一样的严肃，只是比较地要活跃些，每天下午，化学系里飘出奇异的气味，机械系里传出铁槌的声音，生物系的学生对准了显微镜，经济系的学生拨动着统计器，土木工程系的测量旗随风飘扬着，畜牧兽医系的家畜被人解剖着，各系都有着特定的实验工作，默默地在承受着教育，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由于重庆电力不足，中大校方利用校内小溪，水力发电，但因容量很小，一台几十马力的发电机，要供几千人的照明，严重超负荷供电，因此一盏电灯的亮度还不如一支洋烛的光亮，所以往往见到在电灯光下，学生再自己点一支洋烛看书的怪现象。即使如此，中大学生尽可能解决看书的灯光问题，争分夺秒地抓紧学习。晚间的自习要靠汽灯，因为靠近灯的座位光线好，所以晚自习的座位要排号，每天轮流。而在教室里上自修，有的人故意先把电灯泡丝弄断后再接上，果然亮度大增，看书舒服极了，称之为“超级灯泡”。碰到断电时，“总是几十个人围着一盏汽灯做功课”。在宿舍里，“同学们于是动脑筋向空中发展，在空中长廊上自装电灯，变成小阁楼，并备有马灯或洋烛，从此每晚不必抢图书馆，也不受停电、熄灯之限，可以秉烛夜读，通宵达旦”阎。很多同学都是用墨水瓶制成的油灯，作为学习专用灯，“每当夜幕降临，豆大的灯光，宛如点点繁星在夜空中闪烁，莘莘学子在集体宿舍或教室内的油灯下，聚精会神，刻苦钻研，孜孜不倦，蔚然成风”。

中大学生不仅“在学言学”，而且逐步回归到大学应有的校园文化生活之中。抗战时期中大校园文化生活一个突出特点是各界名流竞相到校演讲。由于演讲活动数量众多且频繁，以致学生应接不暇，“一周多至五六次，常以时间冲突，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明。尤其在星期天，“常常有几处讲演同时举行，使你苦于不能分身兼听”。对于各类演讲活动，学生们大都踊跃前去听讲，在当时还流传一句口号：“课可以不上，讲演不可不听！”有中大学生讲述了一段小插曲，从中可以窥见当年活动现场的热烈氛围：

某次，举办西厢记座谈会，由胖教授卢冀野先生主讲。旁听同学之多打破以往记录，后至者已无立足之地，立于窗外之同学极多。卢教授对西厢之蓝本、历史、版本，在文学上之价值等发挥极详尽，继之即开始讨论，情况极为热烈，各同学正忙于舌战之际，忽听得有声大如洪

雷，自屋顶而降。室内同学皆大惊，以为有鬼，继之始发现原来是一站在窗台上，由气窗探首入内之同学所为，彼虽不得“升堂入室”，然仍不愿放弃其权利。至此，室内外之同学皆不禁失笑，认为是“货真价实”的梁上君子。

中大学生文化生活不仅具有学术色彩，而且具有娱乐性和时尚性的一面。当时，中大学生社团活动有以抗战为主旨的，也有以纯休闲娱乐为目的的。有学生社团以爱好音乐为主题，如白雪国乐社，其成员爱好国乐，“他们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演出，更谈不上名利，而是为了自娱消遣，拿取乐器就觉得心情舒坦，把日本侵略者强加给他们的国恨乡愁和生活坎坷暂抛在一边”。有学生社团以组织开展歌咏活动为宗旨，以此丰富日常文化生活，“每当晚餐之后，柏溪小阜，歌声悠扬，此起彼伏，愉快和谐之黄昏，深足以调剂学生一日之疲劳”。

看电影和话剧成为中大学生另一项重要的娱乐活动。内迁后，中大沙坪坝和柏溪校区虽处市郊，重庆的电影院也并不多，然而这并未影响观赏电影仍是战时环境下学生们非常热衷的休闲方式之一。其中，外国影片对大学生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当时好莱坞名片亦踴凉而来，毫不例外也是连夜赶去观看”。针对当时观影热潮，甚至有学生以此为商机，把放电影作为补贴收入的一个途径，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应”。除看电影外，观赏话剧也是当时中大学生的主要休闲方式。因为当时电影院少且票价相对较高，观看话剧成了最受欢迎的大众娱乐项目。中大的话剧团一度数量很多，也比较活跃，演出亦精彩纷呈，“每当一剧演毕，沙坪坝的街头巷尾，便听得满耳是背诵剧中台词之声”。

内迁后，中大学生的文化生活也受到所在地的“地方文化”之浸润。富有特色的重庆当地生活方式深深影响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大学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泡茶馆”。在战时局势相对平稳后，很多中大学生入乡随俗，逐渐喜欢上泡茶馆这一既雅且俗的生活方式，“每当夕阳衔山，便家家客满”中大校友、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坦言大学四年有一半时间都留给了泡茶馆，他对抗战时期中大学生的茶馆生活有着生动而精彩的描述：

诸公茶余溺后，伸缩乎竹椅之上，打桥牌则“金刚钻”、“克奋伯”，纸声甩甩。下象棋则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无牌无棋，则张家山前，李家山后；饮食男女，政治时寮…粪土当朝万户侯！乖乖，真是身在茶馆，心存异邦，眼观世界，牛皮无边！有时桥牌打够了，饮食男女谈腻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换换题目，大家也要谈谈“学问”。就以笔者往还最多的，我自己历史学系里的那批茶博士来说罢，谈起“学问”来，也真是古今中外，人自为战，各有一套；从“通鉴纪事”到“罗马衰亡”，从“至高无上”到“反杜林论”……大家各论其论。论得臭味相投，则交换心得，你吹我捧，相见恨晚！论得面红耳赤，则互骂封建反动，法西斯过激，不欢而散。好在彼此都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来日方长，三朝重遇，茶余溺后，再见高下。

中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战前有着显著不同，不过两者不能完全割裂。中大学生在大后方校园的日常生活既反映出战时化生活的共性一面，也体现大学独特性的一面。由于抗战时间持续较长，学生更为理性地看待自己的身份和角色，逐渐回归正常的大学生活。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适应战时环境过程中，且身处于相对安定的大后方，中大学生也逐渐回归到“学生”的身份和角色。

三、规范教育：“泛政治化”的大学生活

战时大后方的校园生活不仅是纯粹的“私域”，也是校方与国民党政府着力引导、管控的对象。通过对学生生活的规范教育，国民党力图达到控制整个大学教育的政治目的。

西迁以后，中大校方试图以民族危初来统一学生的思想意识，并借机强化管理的政治色彩。关于此有一个具体事例，中大校长罗家伦坚决反对中大学生组织同乡会，认为这是“地方观念”的反映，会阻碍国家统一。但罗的这一要求并没有得到中大学生的充分认可，无论在其执掌中大期间，还是在抗战后期皆如此。1944年，就有中大学生提到，“校友会、同乡会虽以系属地方色彩，上学期已经校方明令禁止，而不如往年之盛，但违令开会者仍属不少”，“壁报”是战时中大校园文化生活的一大特色。所谓壁报，是指在教室门口、走廊、公共黑板张贴的各类不同内容、不同立场的手写或油印的简报。在中大繁多的壁报中，有一部分有国民党背景。其中，“新蕾文艺研究社”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请求每月资助经费60元，且“该社由本党同志主持”，负责出版《新蕾》壁报。而《时风》壁报，其社员大多是国民党员，每月出版两次，也同样请求补助经费每月100元。另外，《建国》壁报是中大区党部的附属团刊物。

中大三青团分团部也有自己的壁报—《青年》和《青年周报》。这些壁报，在很大程度上是宣传国民党意识形态，试图反击和抵制校园内的中共或左派势力。但从整体效果来看，中大校方和国民党对于壁报管理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各式各样的壁报、海报层出不穷，言论开放”。

校方和政府规范学生生活，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和实施军事化管理。校方颁布各项学生生活规定，事无巨细，以军事化为标准，试图渗透到中大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学生在校的言行举止都要纳入管理规定之中，以利于全方位地管控学生。例如《国立中央大学分校军事管理规程》，该规程共有十四章，包含组织、编制、总理纪念周及国旗升旗礼、服装、礼节、军事教室规则、宿舍规则、食堂规则、操场规则、野外规则、值星勤务规则、惩罚规定以及附则等。为示范和带动学生积极参加军训、接受半军事管理生活，中大校方还筹建模范大队，于1939年3月公布了国立中央大学大学模范大队规则，并称“为激发青年抗战建国精神，实施战时生活并完成其预备军官教育起见，设置模范大队”，其成员“由国立中央大学各高年级学生立志愿接受前次训练者组成之”。但是，组建模范大队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主要原因在于人员的来源问题。为此，中大校方不得不将模范大队的报名日期延期。直至同年6月，宣布“模范大队着即暂停，以后另行筹备”。

在罗家伦执掌中大期间，不仅其推行的军事化训练和管理得不到学生的积极响应，而且一些中大学生也不认同这种过于严苛、泛化且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军事管理，认为影响正常生活，也与大学管理根本相悖。1940年12月12日，就有中大学生以宿舍内务问题对校方军事管理提出异议：“按军事管理在集中训练或对于士兵，此项办法可以行通，因系以军事为目的，功课亦甚简单，大学系以受教育为目的，故学生功课繁多，每天笔记报告必须静坐旁抄写，实不能缺少书桌。”

1943年蒋介石出任中大校长后，虽并不负责实际校务，“与教师、学生完全脱离”，但对于实施军事化管理却十分关注。在执掌中大后不久，蒋介石即致电白崇禧：“中央大学军训教官请速照政治学校编组，提前派遣实施为要。”由此，中央大学自1943-1944年上学期起实行更为严格的军事训练，全体学生按年级编为四个大队，实施军事训练及军事管理。蒋介石担任校长期间，学校居然还驻扎有宪兵，直到1944年8月蒋去职后才撤黔。然而，蒋介石对于军事训练的重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只得手谕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中央大学军事训练总教官及教官等，对于该校学生军训毫无改进，自下学期起，各大学军事训练似均可停办。”

为加强对大学生思想的管理和掌控，中大校方还配合国民党和三青团在校内大力发展组织。在国民党组织方面，中央大学于1939年12月10日召开党员大会，选举执行、监察委员，正式成立直属区党部。党员大会出席国民党党员共56人，另有10名党员请假、37名缺席，还有11名新党员宣誓入党。大会由何义均主持，校长罗家伦代表国民党中央指导并监选。最后，大会投票选举产生了区党部执监委员。中央大学校内的党员包括教职员和学生两部分，据蒋宝麟的统计，国民党中央大学直属党部成立后，从1941年到1943年，学生党员占党员总人数的70%；1943年2-5月，学生党员人数占全体学生的7.12%。

在国民党三青团方面，中央大学的第四分团于1939年12月正式改组成立。1941年5月25日，三青团中央大学分团部与重庆沙磁区各校三青团分团部在重庆大学礼堂正式成立。三青团组织在中央大学成立后，团员人数逐年增多。1941年7月，当罗家伦辞去中大校长时，沙坪坝校本部全体团员出席了中大三青团分部出面组织的惜别大会，当时仅有100余人。到1943年2月，柏溪分校就有三青团员300多人，已占全体学生的25%以上。到1944年3月统计时，中大沙坪坝本部、柏溪分校及附属团队的三青团员已到达500名。而到1944年10月，三青团中大分团部为召开团员大会需借用学校大礼堂，此时团员数已多达800人。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大学生自治会均掌握在国民党、三青团学生手中。1943年1月的中大学生自治会改选，当选结果是“除一二例外，余均为三青团。1944年3月，国民党中大区党部在呈中央组织部的报告中更明确指出，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在本党刘兆田等同志领导下，最近即将遵照教育部颁发之学生自治会组织纲要改组”同。据刘兆田本人回忆，当时学生会选举，以几位法学院同学为主组成“某社”，参加者“多数是国民党员”，他们“有组织、有准备的来竞选”，在系科代表大会中选举获胜，最后当选191。国民党、三青团在中大学生自治会中有意识地操控，陶大铺的回忆可以作为另一个侧面的印证：“校内的政治情势良复杂，每届学生会改选时斗争激烈，国民党通过三青团操纵学生选票。有一批三青团员、党棍子，早该毕业了，还不走，一呆就是六、七年，他们是‘职业学生’，为反动政治服务的。”在这种情况下，到抗战中后期，国民党、三青团的政治活动无疑较为成功、暂时性地达到了预防中共、消弧学潮的目的。1945年初，中央大学中共“据点”在向上级报告中也称，“三青团

、国民党在这里思想上的统治力量也特别大”。

然而，国民党的党团组织看似在中大校园内“得势”，但未必“得分”，其真正的影响力值得存疑。因为，在当时普通学生的心目中，国民党、三青团的活动并非引人注目。据校友萧承龄回忆：“三青团在中大是合法的，而且是公开的，团员不是秘密的，但至少是为人所不齿的，他们不大愿意公开身份。国民党在中大有支部，但以国民党出面的活动就更少了，基本上没有碰到过。”萧承龄以上的印象，应该可以说明当时中大校内国民党、三青团真正的政治性活动是在“暗处”，核心的党团员身份也可能是严格保密的。从总体上而言，大多数中大学生与国民党和三青团之间存在着疏离感，而越是到抗战后期，国民党的党、团组织在校园内的处境越是尴尬，其影响力也在逐渐式微，“许多学校的阵地，甚至像中大学生会，也被夺取过来”。

概言之，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大学校园内设立党、团组织，主要目的是出于与中共对抗，渗透国民党意识形态和消弧学潮。在国民党的强力渗透下，中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处于被“泛政治化”的导引之下，总体趋势是战时中央大学校园的政治氛围越来越浓，党派对立越来越强，学生的政治动向也从抗战前期的战时民族主义逐渐向国共意识形态和权势之争转化。在国内政治风云的大背景下，有更多的中大学生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政治活动之中，政治思想越来越活跃，校园政治斗争亦日趋复杂激烈，中大不仅一改在抗战前相对“落后”的状况，而且战后成为引领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

受战时环境影响，中大学生失去了在南京时设施优良的校园，而不得不因陋就简地开始在重庆的的大学生活。在特殊的历史场域中，国家命运和民族生存所面临的危亡局面也投射到大学校园之中，深深地影响到中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呈现出战时化的变化烙印。其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也在学生的精神层面。身处战时环境的中大学生对于抗战救国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思想层面和行动层面融入战时生活中，充分展现出大学生活的战时景象。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战争带来的干扰与震荡并没有增强，反而呈现出衰减的态势，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大学生对于战时环境的不断调适。虽然，抗战的整体环境并没有改变，但高校具有自身的特点，并完全受外在环境的影响。简而言之，抗战的“大环境”与中大的“小环境”之间并非完全等同，前者无法也不可能对后者产生同化效应。在特定历史场域之中，中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与战前有着显著不同，不过也不能因此而完全割裂。在适应了“大环境”后，中大学生也在回归自身的“小环境”，即开始正常的大学生活。甚至于在某些方面，中大学生的大学活更为丰富多彩，反应出大学的内在语境。

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常态”背景下，中央大学的学生生活首先是“私域”性范畴。然而，由学生群体构成的校园生活在抗战时期越来越受到政党和国家的影响，成为一定意义上的“公共性”场域。中大校方和国民政府对于学生的管控力度在不断强化，并且借着抗战的“大语境”来指导和管理学生，试图将学生引入政府预想和设定的轨道之中，加强掌控对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从而造成校园生活的“泛政治化”。

（责任编辑：肖波）